

# 大 读 史 记



下

冯政 /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 读史十记

(下)

冯政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下

卷





在那世人向往、惋惜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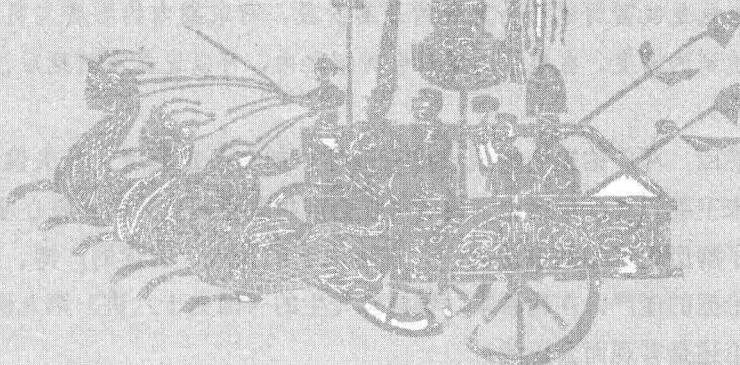
## 风雅两宋：古代社会，生态极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

——朱熹《水调歌头》



## 两宋王朝，三百年历史咏叹调

历史往往呈现一些惊人相似的现象。

东汉末年，乱世纷扰，一代鸿儒蔡邕的女儿蔡文姬自匈奴归汉，追忆往昔，写下传世名篇《悲愤诗》：

汉纪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大唐王朝末期的现象，也大抵如此。

自黄巢起兵，“冲天香阵透长安”，大唐王朝分崩离析，到907年朱温篡唐，自立为帝，建国号“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北方，军阀混战，王朝更替，民不聊生，直至960年，赵匡胤导演“陈桥之变”，黄袍加身，大宋王朝再造统一之势，灭南唐，收吴越，镇蛮荆，定后蜀，平北汉，华夏大半河山复归于天水一朝。北、南两宋延祚三百一十九年，超过大唐王朝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期，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当时世界之冠，后世遂有“唐宋”并称。

现代宋史专家邓广铭给出的评价，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邓广铭全集》）

然而，邓广铭先生的观点虽有高度，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若通读两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读者往往会产生悲喜两重天的矛盾心理。

了解历史真相的方法之一，在于求索的深入、阅读的广博、辩证的思维、论据的谨严。在我看来，樊树志先生的《国史十六讲》第九讲《宋朝》开篇论述是客观而公正的：

在传统史学家笔下，宋朝是屡屡遭受非议、评价不高的时代。比如说，它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总是处于下风，

屡战屡败。阅读这一段历史，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感。其实宋朝有它辉煌的一面，它处在中国历史从中世纪向近世转变的转折点，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无论在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新的黄金时代。

樊树志先生的这种提法，显然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墨菲所著《亚洲史》第七章，就以“中国的黄金时代”为题，对宋朝进行了精彩论述：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重要制度之一的科举制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官员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

就“以史为鉴”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关注：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与大唐帝国不同的两宋王朝？又是什么让懂得历史的人对这样一个矛盾交织的两宋王朝赞誉多于诋毁？开阔而深刻的阅读、思考，让我找到“成一家之言”的答案。

## 赵宋开局：英雄气短，王朝气长

大宋王朝的开创者，是后人论史时常将其与唐太宗李世民齐名的赵匡胤。

赵匡胤生于927年，涿郡（今河北涿州）一户官宦将帅世家，其高祖赵朓在唐朝历任永清、文安、幽都令。赵朓生子赵珽，在唐末积功升任御史中丞。赵珽生子赵敬，历任营、薊、涿三州的刺史。赵敬生子赵弘殷，即赵匡胤的父亲，后周显德年间积功升官到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以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掌管禁军，追封太尉。据史料记述，赵匡胤年逾二十，已是“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年轻时的赵匡胤专喜骑马，复好射箭，驰驱角射，众人多不能赢，骑射本领比一般人高明许多。

北汉乾祐元年（948年），赵弘殷出征凤翔，战败王景，升为都指挥使。时年二十二岁的赵匡胤为之激起一腔壮志豪情，决心不靠父母，凭借自己的实力闯天下，遂孤身西行，寻找机遇。某日，赵匡胤借住襄阳一座寺庙中，一位擅长看相的老僧看了他的面相，说道：“我把我的财物全都送给你当路费，你向北走一定会有奇遇。”

赵匡胤遵从这位长者的叮嘱，向北而行，从此一路高歌猛进，勇不可挡。重要的是，年轻的孤胆英雄赵匡胤跟对了人。

渡过汉水，顺流而上，赵匡胤望见后汉枢密使郭威驻军大营，遂投奔这位未来的后周开国皇帝帐下，从普通士兵做起，三年后补为禁军近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953年，郭威养子柴荣任京都开封府尹，赵匡胤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

954年，柴荣即帝位为后周世宗，在三月的高平之战中，赵匡胤率部大败北汉军，班师回京升任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十月，又升任永州防御使，成为中高级将领。第二年，赵匡胤随周世宗进军淮南，在涡口

(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北)大败南唐军。清流关一役，南唐节度使皇甫晖、姚凤领兵号称十五万人被阻隔在清流关，赵匡胤奋勇攻关，皇甫晖等败走。赵匡胤追击到城下，皇甫晖壮胆说道：“我们各为其主，希望双方摆开军列一决胜负。”赵匡胤朗声一笑，答应了他。皇甫晖整队出城，赵匡胤抱着马脖子直冲上前，一刀砍下了皇甫晖的脑袋，又擒获了姚凤，其勇猛不逊于温酒斩华雄的关羽。后周军威大振，随即攻占滁州，招降天长，再败南唐军于六合。十月，战功赫赫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卫戍司令)，领匡(定)国军节度使。

彼时，赵匡胤年仅三十岁，只用了八九年世间，即由无名小卒连升为高级将领，并获得了武官中最高的节度使衔，襄阳寺庙的老僧所言“奇遇”则一语成谶。

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春，赵匡胤随周世宗出征寿春，连续攻下数个营垒，占领寿州，班师还朝，被封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任殿前都指挥使。入冬，赵匡胤率军队前锋再随周世宗出征濠州、泗州。南唐军在十八里滩构筑营垒，周世宗正商议要用骆驼将部队渡过河去，赵匡胤已一马当先，勇敢横渡，他手下的骑兵也奋勇泅渡，突破十八里滩的营垒，并乘胜攻下泗州，然后顺淮河东下，晚上追击到山阳，俘获南唐节度使陈承昭，占领楚州，在銮江口、瓜步接连大败南唐军队，平定淮南。南唐被迫求和，割江北属地给后周。此次淮南战役，赵匡胤战功第一，以功勋移领忠武军节度使。

959年，后周世宗北伐攻辽，赵匡胤率军首先进抵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辽守军归降，莫州(今河北任丘)、瀛洲(今河北河间)守将相继投降。五月，周世宗因病班师回京。六月，赵匡胤升任禁军最高长官——殿前都检点。数日后周世宗病逝，改变历史的机遇降临到了赵匡胤面前。

这里所说“改变历史的机遇”，指的是周世宗三十九岁便英年早逝，长子柴宗训年仅七岁，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加上“检点做天子”的神符，引发了新任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的野心。

“检点做天子”神符，是后周递嬗赵宋之际的一大奇案。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李重进升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禁

军的最高统帅。“高平之战”后，周世宗改组禁军，殿前司所属禁军成为精锐。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将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提升为新设置的殿前都点检，从而加剧了李重进、张永德两大派系的矛盾。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周世宗北伐辽国，“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旧五代史·世宗纪》）。宋史专家邓广铭推测，这是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张永德而作，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是年六月，病重的周世宗又认为张永德缺乏主见，遂将其罢免，以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在这场“鹬蚌相争”的派系角逐中，置身其外的赵匡胤渔翁得利，成为最大赢家。

五代各帝王中，周世宗柴荣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著称，在位五年半，戎马倥偬，文治彪炳，为结束军阀割据开创统一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是史家公认的五代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然而，在重用赵匡胤的问题上，雄才大略的柴荣却因此葬送了江山。

从表面上看，柴荣病逝那年，三十三岁的赵匡胤资历、声望确实较低，靠着自己的英勇作战和周世宗的超级拔擢，荣升军中精锐的禁军统帅，本应对后周皇室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殊不知，在以实力说话的五代军阀混战格局下，军界英雄、军中统帅的赵匡胤早已羽翼丰满，只待机遇来临，即可取旧王朝而代之。

柴荣有所不知，军阵、战场之外的赵匡胤并不是只晓得“力战”的一介武夫，在义气为重、拉帮结派上亦是高手。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有如下阐述：

五代之时，军中的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互相结缘，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不久，结成军中“义社兄弟”组织，即所谓“十兄弟”：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从《宋史》有纪有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

挥使，王审琦任殿前都虞侯，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李继勋掌管侍卫亲军司，刘廷让任殿前司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史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30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用今天话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具备改朝换代条件的赵匡胤，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机遇而已。

赵匡胤并没有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称北汉勾结契丹入侵镇州、定州。接到边防急报，后周王朝宰相范质、王溥和枢密使魏仁浦未加核实，急派赵匡胤率殿前司军北上御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兵变事件——“陈桥兵变”随即上演。

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将领尊称）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披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披太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宋史》卷一《太祖纪一》）

至此，从前那个身先士卒、战无不胜的马背英雄赵匡胤，成了一位欺负妇幼的篡位者，虽然“黄袍加身”成功，蹑履帝位尊荣无比，内心却是

虚伪、不安的。

针对赵匡胤脱下黄袍，指使部下将宰相范质、王溥等后周大臣押至殿前司公署，直面这些辅弼老臣的重大历史转捩时刻，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多的断代编年史——南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留下意味深长的一笔：

（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

按照史书上的描述，赵匡胤长得方面大耳，紫红色脸膛，身材魁梧，一副力能扛鼎的盖世英雄模样。想当年，后周与北汉军队在高平鏖战，周世宗柴荣亲冒矢石临阵督战，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关键时刻，赵匡胤在阵前大声疾呼：“主公危殆至此，我们怎能不奋力杀敌？”随即“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

当此之际，职位不过马直军使的中级军官赵匡胤何等剽悍、英武，方能领“殿前都虞候”军衔而成为后周王朝第一英雄。如今这样一副英雄气短、“呜咽流涕”的虚伪模样，不知当时世人作何感想？继之猜想：即将诞生的新王朝又将是怎样一副模样？

台湾学者陈文德所著《北宋帝国危机生存》中《用心良苦的不流血政变》章节指出：

1688年，为了对抗专制的詹姆斯二世，英国国会特将其女儿及其夫婿威廉亲王请回英国，继承大统。威廉及玛丽带领的军队在英格兰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伦敦。由于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革命，因此英国的史学家非常推崇，特别称之为“光荣革命”。

而满脑子忠君爱国的中国史学家，一提起陈桥兵变，总是颇有微词，认为赵匡胤这种逼迫孤儿寡母的行为颇不光荣，并以之为赵匡胤一生功业的重大污点。然而从经营学立场看，赵匡胤用心良苦设计的陈桥兵变，与传统史学家的见解是大异其趣的。

从日后的统治行为来看，赵匡胤是个讲感情又富有宽容心的政治领袖。他或许时而过分的热情及积极，但以他节俭朴实的生活看来，绝非野心勃勃的自私自利之辈。他有理想、有自信，治己严、待人宽，也非常努力用心于国事，关心民间困苦。陈桥兵变的良苦用心，值得我们给予肯定的

评价。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成为大宋王朝开国皇帝，摆在这位武人出身的新皇帝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结束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乱世。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画家刘俊所作《雪夜访普图》不算有名，一般的美术史图册也鲜有刊载，但这幅画作表现的内容却在中国政治史上非同一般。

这是在北宋初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银装素裹的汴京城，灯火阑珊，一派静谧。赵普府邸，深宅大院，朱门紧闭，主人正待解衣入寝时，传来一阵清脆的叩门声，家仆开门探视，竟然是当今天子和皇弟晋王赵光义站在雪地里。皇上驾临，岂敢怠慢，赵普急令家厨烫酒烧肉，酒席伺候。身为一国之君，赵匡胤雪夜暗访臣下，当然不是为了“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诗人浪漫，他此行的目的，只为与赵普这位当朝第一谋臣不拘礼节，推心置腹，论衡国是。

赵普气定神闲，从容问道：“暮色深沉，风雪其晦，陛下寒夜出行，所来何事？”

赵匡胤一脸愁容深锁，答曰：“一榻之外，皆为他人所环伺，吾岂能安睡？以此之故，特来见卿。”

赵普再问：“陛下有什么计划、设想？”

赵匡胤试探着说：“吾准备先行北伐，讨灭北汉。”

赵普沉默片刻，表示“不可以”，随即阐明自己的意见：北汉国力不强，且处在北面的契丹和西北的西夏之间，可作为大宋王朝与契丹、西夏两强敌之间的缓冲地带，应留在最后收复，是以“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

赵匡胤一笑解颐，自下台阶：“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

一个从南向北统一华夏的战略就此确立。

雪夜访普，只是宋初君臣国是论衡的开端，开国皇帝赵匡胤还有更大的“心头之患”有待与赵普筹谋而除之。

在下一场更为重要的君臣议事中，赵匡胤与赵普“谋于密室”，探索出一条赵宋王朝特色的解决军阀割据、篡权隐患的长治久安之路。

赵匡胤先发问，直入主题：“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灵涂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赵普直言不讳，坦然作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据说，骤然一听赵普大胆言论，赵匡胤吓了一大跳，当即推掌制止他再说下去：“卿勿复言，吾以喻矣！”

赵匡胤是个聪明人，赵普一席话，为他梳理出一条解决自唐朝中期以来封建王朝军政格局纷乱如麻的思路。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春，赵匡胤相继解除“义社兄弟”之外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的兵权，充任没有实权的节度使。仅仅过了数月，进入炎夏七月，赵匡胤不动声色地对拥戴他黄袍加身的“义社兄弟”动脑筋，于是一幕酒局被写进了中国古代历史：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宋史·石守信传》）

赵宋王朝的“仁慈”向来为后人称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高招被认为是赵宋王朝“重文轻武”的开始，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赵宋王朝军事“软弱”的开始。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开国之初，武人出身的英雄赵匡胤，从未缺少依靠军事实力统一中国的勇气。

北宋建立的第三年（963年），赵匡胤拉开了结束五代十国纷乱割据的大幕。宋军接连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收降吴越，并于开宝元年（968年）出兵北汉，只因契丹辽军驰援，宋军方退。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成熟，命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宋军一路猛攻至北汉首都晋阳城北，

北汉陷入覆亡的困境。就在北宋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发生了宋初三大疑案之一的“烛影斧声”案（另两大疑案分别是陈桥兵变、金匮之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五十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卷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个人而言，赵匡胤的人生结局，其实与诸葛亮一样悲壮。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与开国之初的大唐帝国相比，赵宋王朝军队战斗力不强，缺少纵横天下的霸气，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开国皇帝和赵宋王朝三百年基本路线的确定者，赵匡胤确也难辞其咎，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从主观上就是想要维持一支战斗力不强，不能肩负国防、抗御外侮的王朝大军。

自唐“安史之乱”以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造成的军阀割据，继而为害一方，乃至危害天下的现象，给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造成这一祸乱天下两百余年现象的根源，在于掌控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

“节度使”一词，本意为节制调度，缘起于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梁慬受命主持西方军事，为诸军节度使。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军伐蜀，由司马昭指授节度。南北朝时，刺史大都加使持节、持节、都督，辖区既狭，权任亦轻，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节度使源于魏晋，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而得名。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多被罢黜，但军事活动频繁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镇戍是常设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每遇战事，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

唐高宗时期，为了加强防御力量，解决节度使临时征调的困难，屯戍军设置愈来愈多，且日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为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节度使作为固定职衔，肇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四月，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

唐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成

为固定军区。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其声势烜赫，威仪达于极盛。《新唐书·百官志四》做了如下描述：

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衡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贲印迎于道左。

外重内轻，君弱臣强，节度军镇跋扈，到天宝末年，酿成“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王朝境内遍置节度使，任者多为叛将和平叛战事中崛起的军阀，各统辖一道或数州。军事民政，皆得独立，父死子继，自相世袭，朝廷往往无力征讨，只得承认其地位，史称“藩镇割据”，沿袭至唐亡。

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于极点，皇帝的拥立与废黜，皆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皇帝，均出自节度使。亦曾任匡（定）国军节度使、义成军节度使、忠武军节度使的赵匡胤，对掌控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威胁皇权的隐患，自然明鉴于心。如何破除两百年来节度使为患的痼疾，遂成为赵匡胤、赵普之间君臣国是论衡的重中之重。于是，便有了上述赵匡胤推掌制止赵普“卿勿复言，吾以喻矣”的一幕政治舞台戏。

杯酒释兵权自然是一步高招妙棋，接下来的步骤依然是“好戏”连台。

随着韩令坤、慕容延钊和“义社兄弟”这些军旅大帅的退出，赵匡胤选拔一批资历较浅、威望不高的人担任禁军将领，分设殿前、马军、步兵三个互不统帅、直接听令于皇帝的都指挥使，并在朝廷设立枢密院，专门负责调动军队。如此一来，三个都指挥使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分开，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军权集中于皇帝之手，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兵变的可能性。

随后，赵匡胤开始铲除“节度使”这个数百年的痼疾。

乾德元年（963年），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